



理學叢書

朱子語類

〔宋〕黎靖德編

理學叢書

朱子語

第一冊

〔宋〕黎靖德編
王星賢點校

朱子語類

(全八冊)

[宋] 黎靖德 編

王星賢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橋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08¹/₂印張·2,300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8801—10000冊 定價：116.00元

ISBN 7-101--00415-6/B·82

理學叢書出版緣起

理學也稱道學、性理之學或義理之學，興起於北宋。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頤、程頤，相與論學的有关張載、邵雍，後人又溯及二程的本師周敦頤，合稱「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學說，並汲取周、張、邵學說的部分內容，加以綜合，熔鑄成龐大的體系，建立了理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學派；與此同時，也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別派與之對峙。南宋末，朱學確立了統治地位。元代理學北傳，流播地區更廣。明代，程朱理學仍是正統官學，但陳獻章由宗朱轉而宗陸，王陽明繼之鼓吹心學，形成了理學中另一占主流地位的學派。清初理學盛極而衰，但仍有勢力。康熙御纂性理精義，重用李光地等理學大臣，也表明統治者還在提倡。但頹勢已難挽回，一世學風逐漸轉變為以乾嘉樸學為主流。理學從產生到式微，經歷約七個世紀。而它在思想界的影響，直到我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蓬勃地開展起來以後，仍然不可低估。理學在思想上統治的時間之長，影響的廣泛深入，超過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

理學為了給封建秩序提供充分的理論根據，繼承古代儒學，融會佛老，探討了宇宙本原、認識真理的方法途徑、世界的規律性和人類本性等哲學問題，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並涉及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諸多領域；繼承改造了許多舊有的哲學範疇和命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範疇和命題，進行

了細致的推究。「牛毛繭絲，無不辨晰」(黃宗羲明儒學案凡例)，雖有煩瑣的一面，也有精密的一面。就理論思維的精密程度而論，確有度越前代之處。在我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影響。理學在歷史上曾起過維持社會安定、促進國家統一的作用，但也起了維護禮教、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作用。進入近代以後，它的反動作用更加突出。近代的新文化運動批判舊文化，理學也在衝蕩之列，這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是作為民族哲學遺產的一部分，我們不應將它一筆抹殺，更沒有理由無視它的歷史存在。

建國以來，學術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理學，取得了很大成績，這是建國以前所不能比擬的。但在一段時間內，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妨礙了對理學進行實事求是、全面系統的研究，有關古籍、資料的整理也未能很好地開展。近幾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有關的論文、專著多起來了，有關的學術討論會也不斷召開。為配合研究需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〇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列入了理學叢書，並開列了選目。這套叢書將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

理學著作極為豐富，有大量經注、語錄、講義和文集。私人撰述之外，又有官修的讀物如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也有較通俗的以至訓蒙的作品，使理學得以向下層傳播。本叢書只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由於學術界對理學與非理學的界限、理學終結於何時等問題還有不同的認識，理學著作中哪些是最重要、必須收入的，也需要進一步研究；所以在工作過程中，對原選目可能會有局部的增刪調整。凡收入的書，一般只做點校，個別重要而難懂的可加注釋，或選擇較有參考價值的舊注本進行

點校。

熱切期望學術界關心和大力支持這項工作。

中華書局編輯部一九八三年五月

點校說明

本書用清光緒庚辰（一八八〇年）賀瑞麟校刻本（即劉氏傳經堂本，簡稱賀本）爲底本，參校本有明成化九年（一四七三年）陳煒刻本（簡稱陳本）、清康熙間呂留良天蓋樓刻本（簡稱呂本）、清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年）應元書院刻本（簡稱院本）、明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年）朱吾弼編刻本、日本寬文八年（一六六八年）刻本，經抽對若干，與底本無多出入，故未詳校。

校勘過程中，凡屬明顯錯別字則徑改；凡有疑問則出注標明「似當作某」或「似誤」，以備一說；其他校改，均一一出注當面，並於正文加上符號以資識別：用圓括號者表示刪，用方括號者表示增、改。

在標點符號運用方面，若全條均屬朱子語則不標引號，凡有問答及引據之處則一一標明；若文義顯明則不用頓號，易混之處則一一標明。

賀本原有正馮一卷，因賀氏已將正文逐條改正，故刪去。原有記疑一卷，凡可資借鑑者，均隨正文出注於當面；其餘經校改後已無疑，故不再羅列。

本書結構除雙行小注改排單行外，一切依舊。

本書由王星賢負責點校，請鄧艾民審閱並作序，最後由編輯部定稿。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

朱熹與朱子語類

朱熹，字元晦，生於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祖籍徽州（今安徽歙縣）婺源（今屬江西）人。他的父親朱松在福建南劍（今南平）的尤溪縣做縣尉時，他出生在尤溪。宋寧宗慶元六年（一二〇〇年）死於建陽。

朱熹十九歲中進士，做過五任地方官。二十四歲在泉州同安縣任主簿，二十八歲去職。自此以後一直到五十歲以前，他只擔任過一些有官無職的閒差事。五十歲時任知南康軍約兩年。五十二歲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約一年，因彈劾唐仲友與宰相王淮不和辭職。六十一歲知漳州，推行經界清丈田地，為當地豪強所阻，任職一年多就卸任了。六十五歲知潭州，半年後被召至朝廷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歷時僅四十天，因上疏告韓侂胄被免職還鄉。六十七歲又被胡紘、沈繼祖彈劾宣揚偽學而落職罷祠，因學術思想連掛名的官也丟了。七十一歲時在學禁的空氣壓力下去世。

朱熹一生實際從政的時間並不多，正如宋史朱熹傳所概括的：「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大半生都從事於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他任同安縣主簿時就有青年跟隨學習，一直到五十歲以前，從學的弟子為數不多。他五十歲任知南康軍，復建白鹿洞書院，經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五十四歲在福建崇安武夷山下建武夷精舍，「四方士友來者甚衆」。六十一歲知漳州，

刊印四經四子書，經常到州學「訓誘諸生」。六十五歲知潭州，修復嶽麓書院，「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後來回到建陽考亭，修建滄州精舍，「學者益衆」，（以上引文見朱子年譜）最多曾達到數百人。這時他已安心在此講學終生，曾寫滄州歌一首抒懷，其中有句云：「春盡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州。」（朱文公文集卷十水調歌頭）朱子語類中的問答語錄，就是他一生從事教育所保存下來的師生問答的記錄。

(一)

在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中，朱熹首先是作為宋、明客觀唯心主義理學集大成的人物著稱的。他的哲學思想，從宋代末一直到清代晚期為止的七百年中，都占有統治地位，成為幾個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學。朱子語類中相當多的卷數都是直接闡述他的哲學觀點的。

從世界觀說，他認為宇宙的最高存在或本體就是太極，整個世界萬物都是太極產生的，所以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極圖說解）宇宙的本體就其具有無聲無臭之妙，不能為感性認識所把握而言，叫做無極；就其能產生世界、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而言，叫做太極。太極是無限的、永恆的、絕對的，所以說：「太極只是個一而無對者。」（語類卷一百）太極又是至善的，所以說：「太極祇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的表德。」（語類卷九四）太極有動有靜，「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同上）一動一靜而兩儀分，一變一合而五行具，從而「人物生生，變

化無窮矣」。(太極圖說解)

太極是絕對的本體，從而必然產生陰陽天地萬物，這是就宇宙的本源說的。若就具體事物的構成說，則太極與陰陽不可分，所以說：「自現在之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語類卷七五)具體事物生成時，太極與陰陽相結合而不可分，這也就是說：「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語類卷一)朱熹認為理與氣不可分，似乎是一種二元論，但他又說，在理氣的關係中，究竟是以理爲本：「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同上)再則，照朱熹的看法，「理爲不生不滅」，(語類卷一二六)而氣却是有生有滅，並不斷由理產生氣：「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至于理與事的關係，他更明確提出「未有這事，先有這理」。(語類卷九五)由此可見，朱熹的哲學體系爲客觀唯心主義的理一元論還是很清楚的。

朱熹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理一分殊，他說：「祇是此一個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祇是一個理，此理處處皆渾淪。」(語類卷九四)這也就是他所說的「物物有一太極，人人有一太極」。(同上)朱熹所謂理一的理與分殊的理之間的關係，既不是一般和特殊的關係，也不是全體和部分的關係，而是一種帶有神秘主義性質的類似大宇宙與小宇宙的關係。這種關係他無法運用邏輯分析加以說明，而只能借用月印萬川的比喻來描述。他說：「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得這些道理。」(語類卷十八)實際上，朱熹引用玄覺禪師的永嘉證道歌，並不僅僅是玄覺也窺得這些道理，而是他和程頤吸收了玄覺等的「一卽一切，一切卽

一」的思想，作為他的太極說的一個根本觀點。從朱熹主張理一分殊和理雖不生不滅而氣有生有滅的這些觀點看，過去有些學者將朱熹的理氣學說與亞里士多德所謂形式和質料作類比，並不完全恰當。

朱熹的世界觀的這些基本觀點，追溯源流，他的太極說來自周敦頤，他的理一元論來自二程，他又吸收了張載關於氣的某些觀點，並將氣表面上列在與理同等的地位。他編輯近思錄與伊洛淵源錄，將周、程、張、邵等並列，表明他繼承和綜合了他們的各種觀點，組成一個龐大的體系，因此，在語類中有不少卷數記載他與弟子們討論他們的著作和思想的語錄，實際上也是對他自己的哲學觀點的闡述。

從認識論說，他繼承了程頤格物窮理的思想，認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補大學格物傳）他所謂的格物，就是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他所謂的窮理，就是「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同上）格物窮理的認識過程，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的漸進階段。在這個階段，既包括直接接觸事物的「格物」，「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從而獲得感性認識；又包括運用邏輯推理的「窮理」，「以理之深淺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因其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從而獲得理性認識。

第二階段是豁然貫通的頓悟階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補格物傳）到了這個階段，就格物說，則已格盡事物之理；不是只認識部分的理，而是認識理的全體。他說：「若是窮得三兩分，未便是格物；須是窮理得到十分，方是格

物。」(語類卷十五)就致知說，則已達到無所不知的知至。若只有部分的知、片面的知，都不是知至。他說：「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同上)這就是格物與致知的統一，窮理與盡心的統一。

格物窮理，必須將漸進階段與頓悟階段結合起來，才能達到完整的認識。根據這個觀點，他批判當時兩派不同的思想。一派是以呂伯恭為代表，只求博觀，實際上要求只通過漸進階段，窮盡天下的理；一派是以陸九淵為代表，只務反求，實際上要求只通過頓悟階段，發明本心，這都是片面的。他說：「今人務博者，即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語類卷十八)他又批評說，「伯恭失之多」，因為只務博求多就流於支離，「子靜失之寡」，因為只務約求寡就陷入空疏。只有他的格物窮理的學說，由博返約，才是全面的正確的認識途徑。語類中保存了從不同角度對這兩派思想方法的批評，有助於我們更細緻更深入地了解他的認識論的觀點。

朱熹的道德觀與他的認識論是密切相連的。操存涵養與進學窮理既有區別，又相互聯繫。就二者的區別說，他很贊揚程頤的兩句話：「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因此他提出：「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語類卷九)但他認為二者又相互聯繫，相互促進，所以說：「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語類卷九)這種相互關係，也可以叫做「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關係，在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關係中，他早年着重將兩者並列，而晚年則感到過去對尊德性的重視不夠，而肯定應該「以尊德性為主」，所以說：「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

祇說一個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祇是如此，更無別事。某向來祇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語類卷六四）

致知與涵養的關係也與知行關係密切相關。朱熹在知行關係中是明確主張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的。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語類卷九）在這裏，他也強調知行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有如目與足的關係一樣，所以他也說：「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語類卷七三）

朱熹認爲，理表現在人身上就叫做性，他繼承程頤「性卽理也」的基本思想。但他比程頤更明確地將性區分爲兩種：一卽天地之性，係「專指理言」；一卽氣質之性，係「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爲天所命，所以又叫天命之性。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不相關，「才有天命，便有氣質」。《語類卷四》天命之性是善的，氣質之性則受氣所累而有不善。稟氣之清者爲聖爲賢，稟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人的目的，從性方面說，就是要變化氣質，克服「氣質之性」帶來的不善因素，恢復天命之性的至善。從心方面來說，未發之前，是心的本體，也就是天命之性；已發之際，是心的作用，也就是情。所以說：「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語類卷四）性是善的，情則有善有不善；流於不善，卽受物欲的引誘與蒙蔽。本體的心，是天理的顯現，叫做道心；人心可善可不善，流於不善，卽是人欲。人的目的，從心方面說，就是要使人心服從道心，存天理而滅人欲。

朱熹根據他的人性論的根本觀點，批評佛、老的學說。儒家以性爲實有，主張性卽理也，而理爲不

不滅。道家之說是「半截有，半截無」，佛家之說「則是全無」。儒家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語類卷百二十六而「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同上）儒家只是存天理，「更無分毫私見」，而「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同上）語類中記錄許多這一類對佛、老的批評，比他文集中的理論分析更能擊中要害。

(11)

現在的朱子語類是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〇年）黎靖德編輯出版的。當南宋理宗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時，黎靖德根據南宋寧宗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李道傳編輯的池州刊朱子語錄、南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李性傳編輯的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南宋理宗淳祐九年（一二四九年）蔡抗編輯的饒州刊朱子語後錄三種按記錄人編排為不同卷次的語錄和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年）黃士毅編輯的眉州刊朱子語類、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年）王必編輯的徽州刊朱子語續類兩種按主題類別編排為不同卷次的語錄，綜合起來，刪除其文字和記錄人完全重複的條目後，乃按黃士毅編輯的朱子語類所用的主題類別加以編排，出版了比較完整的景定本朱子語類。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吳堅編輯出版建州刊朱子語別錄，黎靖德又將這本朱子語別錄中的一些新條目編入景定本朱子語類中，於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〇年）出版，這就是現在這本朱子語類的初版。

朱子語類編集了朱熹死後七十年間所保存的語錄，在當時雖然是較完備的，但仍有一部分重要材

料在這期間已經散失了。李性傳談到：「先生又有別錄十卷，所譚者炎、興以來大事，爲其多省中語，未敢傳，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饒州刊朱子語類續錄後序）蔡抗也提到有一本朱熹親自刪定他與蔡元定的論學記錄翁季錄，「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饒州刊朱子語後錄後序）現存朱熹適孫朱鑑所輯集的朱文公易說和文公詩傳遺說中，有些條目也是這本語類所未列入的。從這些情況以及其他有關材料推測，魏了翁所說，「則公之說，至是幾無復遺餘矣」（眉州刊朱子語類序），即使應用到黎靖德所編的這個本子，也是不完全切合實際的。

朱子語類綜合了九十七家所記載的朱熹語錄，其中有無名氏四家。輔廣所錄的一部分，曾經朱熹本人審閱，（朱子語類後序）其他各家則未經朱熹過目。雖然如此，但這本語類將朱熹許多同一次談話因記錄人不同而留下數條詳略不同的記錄稿都保存下來，這樣編輯增加了這些條目的可靠性，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朱熹的原意。黎靖德編輯這部書時，也將每個人記錄的語錄的年代都保存下來，自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年）開始到宋寧宗慶元五年（一一九九年）朱熹逝世前爲止，歷時共約三十年。在九十七家記錄人之中，記錄朱熹六十歲以後的語錄多達六十四人，因而更詳盡地保存朱熹許多晚年定論，這是朱子語類的特點和具有更高參考價值的所在。

關於朱子語類在研究朱熹思想中的作用，當宋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第一部池州刊朱子語錄出版時，就有不同的意見。黃榦爲該書作序時就曾提到：「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師傳之本旨。」（池州刊朱子語錄後序）事後他又寫信給該書的編輯者李道傳說：「不可以隨時應答之語，易平生著作之書。」（饒

州刊朱子語類續錄後序引。對語錄的出版，殊不滿意。但李道傳的弟弟李性傳編輯饒州刊朱子語類續錄時，就引用朱熹本人對編輯程頤語錄必要性的說明加以辯解：「伊川在，何必觀；伊川亡，則不可以不觀矣，蓋亦在乎學者審之而已。」（同上）此後各種朱熹語錄陸續出版，終於引導黎靖德綜合起來出版這部比較完備的朱子語類。

清朝初年，在研究朱熹思想的過程中，關於語錄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康熙時，李光地等奉旨編纂的朱子全書採用語錄甚多，但在凡例中仍說：「語類一篇，係門弟子記錄，中間不無訛誤冗複，雜而未理。」對朱熹思想研究比較細緻並編寫朱子年譜的王懋竑也認為，其中不可信的部分頗多。他說：「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即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況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為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王篋聽先考王公府君行狀引白田草堂存稿附錄）李穆堂編輯朱子晚年全論時，也不採用語錄，聲稱：「善學朱子者，毋惑於門人訛誤之詞，而細觀其晚年所著述，庶不為世俗爛時文破講章所愚也。」（穆堂別稿古訓考）只有與王懋竑同時的朱止泉，崇奉朱熹思想，却極重視語錄，認為記載了朱熹晚年精要的見解，即使其中雜有不確之處，若善於分析運用，就是研究朱熹思想不可忽視的材料。他說：「語類一書，晚年精要語甚多，五十年前，門人未盛，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浙東歸，來學者甚衆，誨諭極詳，凡文詞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警咳如生，一片脍懇精

神，洋溢紙上……是安可不細心審思而概以門人記錄之不確而忽之耶？」（朱止泉文集答喬星渚）從總的方面來說，朱止泉這樣評價，並不過分。特別是語錄中有些晚年的思想，糾正他早期著作中某些意見，更可看出語錄的價值。何況語錄中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在他的文集中有敘述簡略甚至完全缺如的，語錄的重要性就更明顯。具體說來，像李性傳所採取的態度還是比較穩妥的：「故愚謂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爲助。與詩、易諸書異者，在成書之前，亦當以書爲正；而在成書之後者，當以語爲是。學者類而求之，斯得之矣。」（饒州刊朱子語類續後序）

(三)

朱子語類所談到的內容，全部一百四十卷中，四書占五十一卷，五經占二十九卷，哲學專題如理氣、知行等，專人如周、程、老、釋等，以及個人治學方法等，約占四十卷，歷史、政治、文學等約占二十卷。雖然李性傳所說「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似乎語錄對研究朱熹有關四書的見解，只具有輔助的作用，但有些問題只有通過語錄才能獲得比較完整的認識。

首先，結合語錄和文集，我們了解四書集注的成書過程，表明他的確曾用平生精力進行工作。第一步是收集關於四書的各種注解，特別是二程及其門徒的注解，反復選擇編成精義、要義或集義。然後從集義中選出他認爲正確的解釋加入集注，並在此基礎上發揮他的觀點。再作或問來闡述他所以如此注解的理由，解答別人可能提出的問題。對於四書所涉及的音讀訓詁、名物制度，仍多採用漢、魏